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研究 ——基于河南省商丘地区样本的计量分析

谢辉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以2006年河南省商丘地区的840户农民家庭的调查样本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探讨农民务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地区类型和外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年龄、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从业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应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并由政府部门及时向农民工发布用工供需信息。

关键词:农民务工收入; 计量模型; 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0)01-0058-05

本文旨在通过对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实证分析,深化对当前农民务工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认识,并探讨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为河南省商丘市统计局对2006年商丘地区840户农民家庭进行的住户调查,样本分布为:睢阳区、民权县和永城市各80户,梁园区、睢县、宁陵县、虞城县、柘城县、夏邑县各100户。在上述农民家庭中,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农民659人。本文对这659人的务工行为及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

一、外出务工农民概况

(1)外出务工农民以男性为主。在659名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436人,所占比例为66.2%;女性223人,所占比例仅为33.8%。

(2)近2/3的外出务工农民年龄在30岁以下。30岁以下的外出务工农民占总数比例为64.5%,40岁以上的仅占17.1%(表1)。

表1 外出务工农民年龄分布

目标人群	人数	占比(%)
20岁以下	181	27.5
20~30岁	244	37.0
30~40岁	122	18.5
40~50岁	86	13.1
50~60岁	19	2.9
60岁以上	7	1.1

(3)外出务工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总体来看,外出务工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初中为526人,占总数的79.8%;高中为55人,占8.3%;小学53人,占8%;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12人,占1.8%;中

专9人,占1.4%;大专及以上学历4人,占0.6%。

(4)59.2%的外出务工农民未接受过任何劳动技能培训。

(5)从农民外出务工的地区来看,近70%的农民选择到外省打工(表2)。

表2 外出务工农民务工地区分布

务工地区	人数	占比(%)
乡内	63	9.6
乡外县内	50	7.6
县外省内	93	14.1
省外国内	453	68.7
国外和港澳台	0	0

在具体的务工地点的选择上,30.2%的农民选择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50.2%的农民选择到地级市。

(6)85.9%的外出务工人员曾经有过外出务工经验。

(7)83%的外出务工农民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8)90.9%的外出务工农民未参加劳动保险。

(9)大多数农民外出务工是通过亲属介绍。

表3 外出务工农民外出方式

外出方式	人数	占比(%)
政府组织	9	1.4
中介机构介绍	50	7.6
亲属介绍	457	69.3
其他	143	21.7

二、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统计特征

用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除以外出务工时间得到外出务工月收入。在659人的样本中,除1人未填报

收稿日期: 2009-04-20

作者简介: 谢辉(1978—),女,博士研究生。E-mail: lx2005885@126.com

外出务工时间而无法计算月收入外,其余 658 人的月收入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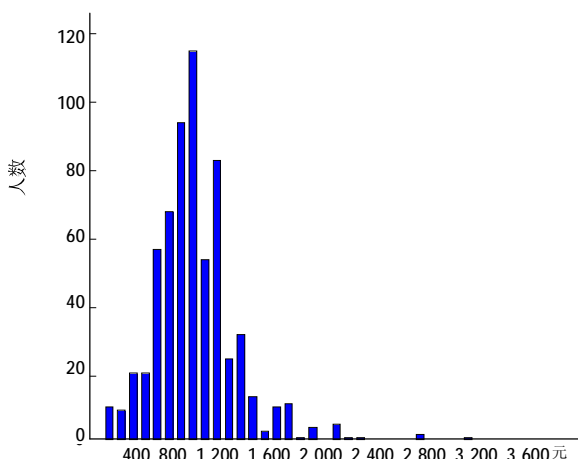


图 1 外出务工农民月收入分布

图 1 显示了河南商丘地区外出务工农民月收入分布的统计特征,该分布的偏度为 2,峰度为 10.6,月收入平均值为 881.6 元,中位数为 818 元,极大值达到 3 500 元,极小值为 100 元,方差为 415.28。

(二)计量模型设定

以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为因变量,自变量的设置如表 4 所示。

表 4 回归模型变量设置

自变量	取值	含义
性别 (G)	1	男
	2	女
年龄 (A)	1	20 岁以下
	2	20~30 岁
	3	30~40 岁
	4	40~50 岁
	5	50~60 岁
	6	60 岁以上
接受教育程度 (ED)	1	文盲半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
	5	中专
	6	大专及以上
接受培训情况 (T)	1	曾接受
	2	未曾接受
从业地区类型 (AR)	1	直辖市
	2	省会城市
	3	地级市
	4	县级市
	5	建制镇
	6	其他地区
外出务工经验 (EX)	1	曾外出从业
	2	未曾外出从业
签订合同情况 (C)	1	已签订
	2	未签订
外出方式 (M)	1	政府组织
	2	中介机构介绍
	3	亲属介绍
	4	其他

运用 Eviews 对上述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得到表 5 中的结果。

表 5 回归模型变量设置

回归系数	回归结果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C(1)	7.253 857	0.206 466	35.133 430	0.000 0
C(2)	-0.022 814	0.039 268	-0.580 974	0.561 5
C(3)	0.060 052	0.016 289	3.686 602	0.000 2
C(4)	0.038 085	0.030 156	1.262 962	0.207 1
C(5)	-0.228 673	0.037 540	-6.091 508	0.000 0
C(6)	-0.035 276	0.017 824	-1.979 049	0.048 2
C(7)	-0.187 446	0.050 395	-3.719 530	0.000 2
C(8)	-0.180 110	0.048 262	-3.731 926	0.000 2
C(9)	0.067 289	0.030 306	2.220 296	0.026 7

从表 5 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log(\text{WAGE})=7.253\ 857-0.022\ 814G+0.060\ 052A+0.038\ 085ED-0.228\ 673T-0.035\ 276AR-0.187\ 446EX-0.180\ 110C+0.067\ 289M$$

上面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下事实:

(1)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地区类型和外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2)年龄、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从业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显著,且年龄增长、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具有外出务工经验、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均有正向影响。

(三)模型的含义

上面的计量模型蕴含以下含义:

(1)性别对农民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意味着务工农民收入分配中的性别歧视有所减弱,市场的公平性有所增强。此外,在纺织、家政等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对女工的需求较大,使得女工反而可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似乎有悖于常理。通常认为,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而人力资本增长应当对收入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主要就业于知识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这些岗位因为劳动相对简单而不足以显示出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差别。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一个阈值,或者说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是平滑的,在达到某一个阈值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才能跳跃性地显示出来,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其受教育程度尚在阈值以下。二是教育的有效性不足,即教育未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得到佐证。

(3)从业地区类型对农民务工月收入影响不显著似乎也符合直觉相异,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大城市的收入水平较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农民未能分享到城市经济高速增长成果,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民务工收入增长脱节,农民务工收入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二是从地域范围来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形成之中,市场对劳动力定价趋于一致,地域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减弱。

(4)外出方式对农民务工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一般来说,政府或中介机构在组织劳务输出时,具有较强的工资谈判能力,对于提高农民的务工收入应当具有正向作用。而上述计量模型的结果可能意味着政府或中介机构在组织劳务输出以及工资集体谈判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5)年龄与农民务工收入之所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可能是由于经验积累和技能提高使得劳动力价值得到了提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弥补了体能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6)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对农民务工收入的正向影响完全在意料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上文中提到的教育有效性不足从而导致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影响不显著的佐证。事实上,由于劳动技能培训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对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很可能大于泛泛的一般性的教育,特别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岗位对操作技能和熟练性要求较高,而对理论性、创造性要求较低,使得劳动技能培训对收入增长更具价值。

(7)有过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务工收入较高。一是在同样岗位上,有务工经验者因为具有更多的经验积累而获得更高收入;二是具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对城市的就业环境更为了解,往往能够寻找到收入更高的岗位。

(8)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务工收入的正向作用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与雇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企业通常自身质量较好,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较为规范,这类企业的员工工资和福利水平也相应较高;二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中工资集体谈判的可能性比较大;三是签订合同的企业劳动保护意识较强或企业所在地劳动保护制度较为严格,这意味着最低工资制度等促进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政策能够得到更好的落实。

三、对计量模型的拓展

我们将农民务工收入理解为农民将自身劳动力

出租给雇主而获得的租金收入。之所以将农民务工行为视为劳动力出租而非出售^{①-③},原因有二:一是劳动力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体力、智力、技能等劳动力的各项组成要素仍然依附于劳动者,而并未转移为雇主所有;二是雇员的劳动力只是在一定时间如劳动合同存续期内为特定雇主所使用,合同终止后,劳动者而非原来的雇主将以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在市场上继续交易。据此,我们将农民务工获取收入视为农民出租劳动力获得租金的过程,这一过程类似于狭义资本市场上资本与利息的关系。

利息是一定时期内借款(本金)数额与利率的乘积。其中,利率取决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物价水平,法律、历史和传统因素以及国际利率等因素。类似地,可以把收入定义为劳动力与劳动报酬率的乘积(此处忽略资本回报)

$$i = l(a, g, ed, t, ex, x) \times k(K, D, S, P, X)$$

其中, i, l, k 分别代表个人收入、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和个人劳动报酬率, a, g, ed, t, ex, x 分别代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培训、从业经验及其他个性化因素^④, K, D, S, P, X 分别代表平均劳动报酬率、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劳动保护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和市场两个因素。

(一)劳动力同质性

从2006年河南省商丘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样本来看,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务工经验等决定个人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因素明显趋同,集中度均接近或超过2/3,其中外出务工经验一项,集中度高达85.9%,即超过80%的农民具有外出务工经验。这种趋同性直接导致劳动力呈现高度同质性^⑤,从而大大降低了外出务工农民样本的信息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上述计量模型中一些因素的不显著。此外,在下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外出务工农民的劳动力同质性还将对整体收入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弱质性

农民外出务工需要面对统一的多层级的城镇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所提供的劳动力同质且质量偏低,他们就被挤压到市场的低端,因此,虽然并不显性地存在专门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但事实上这一市场已经隐性地被分割出来,并且从以下特征来看,显然是一个弱质市场。

首先,市场主体发育不平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

①在资产运营一般模式中,工资收入被视为实体资产信贷化的结果。

②劳动力异质性被认为是劳动者工资收入超越最低必需支出的重要条件,农民工劳动力同质性从反面说明了低工资的原因。

上,市场主体通常包括企业、个人、政府、中介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且这些主体之间存在相对合理的力量对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但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政府一度缺位,中介机构发育滞后,企业过于强大,而务工农民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作为支撑,力量十分弱小,就如同跷跷板的一头是大象,一头是绵羊。其次,市场结构单一。劳动力的同质性不仅造成供给的单一,也影响到需求的单一,使得整个市场在低端徘徊,层级不分明,且提升的难度较大。再次,市场信息传导机制不畅。信息传导机制是现代市场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效率。从就业信息来看,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网络等现代化信息传媒应用受限,加之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大部分农民仍然主要依靠亲属之间奔走相告的原始方式来获取就业信息。从政策信息来看,由于雇用农民工的大多是中小企业,缺乏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固有的政策信息传导渠道和敏感度;农民工组织松散,不利于信息的快速传导;政府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和惩罚不力等各种因素,使得政策信息在这一市场的传导效率偏低。

(三) 农民务工收入的再认识

劳动力的同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弱质性,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民务工的收入状况。

(1)关于平均劳动力报酬率。在对农民工劳动力进行定价时,雇主所参照的平均劳动报酬率是分割劳动力市场而非统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劳动力报酬率,这就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脱节。

(2)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从供给方面看,外出务工农民劳动力的同质性,一方面使得能够满足岗位特殊技能要求的劳动力十分稀缺,另一方面在一般的低端岗位上又必然加剧农民工内部的竞争,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同时,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向更高级岗位的转移空间较小,使得其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性较弱,被进一步固化在低端岗位上。从需求方面来看,雇主对外出务工农民的需求容易出现经济上升期快速扩张、经济衰退期大量收缩的现象,使得农民外出就业随经济周期的波动可能相对较大。这是因为农民由于自身劳动力素质等原因,很难占据关键岗位,二是同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性很高,三是招聘或解雇农民工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务工农民收入不仅偏低而且相对不稳定。

(3)关于经济政策。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政

府面临三方面的困境:一是调控手段匮乏。在货币市场上,中央银行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法宝,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政府的调控手段要少得多,特别是直接针对收入进行调控的,仅有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小时工资制度这一工具。二是政策传导不畅。三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难度大。后两点在前面的分析中都已提到。在这样的困境下,政府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无疑要打折扣。一些地方甚至连最低工资制度也不能得到好的落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四、为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而改善政府服务的政策建议

近几年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农民收入中增长空间最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要根本扭转农民工劳动力的同质性和市场的弱质性并存的现象,促进农民务工收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还需要分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既要有能够较快见效的当期措施,也要从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体制等作长远考虑。当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动农民务工收入增长。

(1)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加政府投入,扶持一批培训质量高、社会信誉好的培训机构,对组织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企业和参加培训的农民给予补贴。推动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或中介机构调查了解农民工的技能状况和企业用工要求,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发展订单式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农民工的技能现状,分别开展基础、中级和高级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劳动力供给分级,使得一部分农民工能够率先上升到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中去。利用电视、广播等农民熟悉的媒体,开展劳动技能培训,传播技术知识的同时,加大对技能培训的宣传力度。

(2)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针对最低工资制度落实情况 and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加强劳动执法监查。建立农民工工资调整机制,定期开展农民工工资水平调查,根据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指数等变化,适时调整农民工工资行业指导线。

(3)政府有关服务部门应该向农民及时发布农民工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以收入为导向指导农民工的就业调整策略,以帮助农民工解决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何小锋,韩广智. 资本市场理论与运作[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28-32.
[2] 何小锋,黄嵩. 关于资产运营的一般模式构建[J]. 学术研究,2002(2):5-9.
[3] 谢辉. 资产运营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收入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6):82-86.
[4] 白明,雷箐青. 转轨时期职工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J]. 特区经济,2007(6):257-259.
[5] 郭继强. 低收入者工资决定模型——一个统一若干著名理论新视域的理解[J]. 社会科学战线,2006(2):71-77.

A Research on Countryman Workers' Income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XIE Hui

(School of Economic,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ountryman workers' wage, and help to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countryman's income, the survey sample of 840 rural households of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was analyzed by econometric methods to reveal the determinants of countryman workers' wage as well as provid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ments including gender, education, working area and the way of going to citie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determination of wage while age, training, working experience and labor contract are quite significa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ndeavor to develop training of countryman workers, strengthen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n time release the supply and demand information of countryman workers.

Key words: countryman workers' income; econometric model; labor market

[责任编辑:孟青]

(上接第 57 页)

A Study of the Building of Penalty Calculation Model in the Sales Agent Contract of Real Estate

LIN Guang-li¹, JIANG Hui-jie², ZHANG Jin-hui³

(1.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2.Shenzhen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Shenzhen 218045;

3.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breaking of contract brings about a serious loss to the ag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al estate agents sales. It is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penalty signed by both sides in the contract accuratel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penalty calc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creasing the developer's profit margin bound.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amount of penalty wa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opportunity costs, marketing costs and the risk costs of agents; the profit margin wa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expectation profit margin of developers. Ultimately the penalty range was determined. And then a calculation model was tested through a numerical exampl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nalty calculation model provided a basis to the sale agents in the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to ensure their own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a "win-win" situation could be reached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Key words: principal-agent theory; real estate developer; agent; penalty; profit margin

[责任编辑:孟青]